

朱志荣 / 主编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

ZHONGGUO SHENMEI YISHI TONGSHI

· 清代卷 ·

杨明刚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朱志荣 / 主编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

ZHONGGUO SHENMEI YISHI TONGSHI

· 清 代 卷 ·

杨明刚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方国根
责任编辑:夏青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 清代卷/朱志荣 主编;杨明刚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7-01-017766-3

I. ①中… II. ①朱…②杨… III. ①审美意识-美学史-中国-
清代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8275 号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

ZHONGGUO SHENMEI YISHI TONGSHI

(清代卷)

朱志荣 主编 杨明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5.75

字数:530 千字

ISBN 978-7-01-017766-3 定价:1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003
一、清代经济发展与清廷财政格局	005
二、清廷极权一统与清代社会格局	018
三、清廷文化政策与清代思想流变	031
四、清代审美意识研究的路向	044
第一章 小说审美意识	061
第一节 清季小说审美概述	062
一、清代小说发展概览	062
二、清代小说及其审美研究	069
三、清代小说审美意识流变	073
第二节 幻境意象·灵异叙事·隐喻思维	081
——《聊斋志异》审美意识系统	
一、引言：回归聊斋美学研究的审美意识起点	082
二、幻境意象：“出入幻域、顿入人间”的不羁创构	086
三、灵异叙事：“班马之笔、意在作文”的模式鼎革	093
四、隐喻思维：“冥会幽探、曲尽世态”的道本追索	098
五、结语：《聊斋志异》审美意识系统	102
第三节 群体意象·多元叙事·民族思维	102
——《红楼梦》文本审美意识研究	
一、引言：回归红楼美学研究的文本起点	103

二、群体意象创构:立意高奇,设象寓空	112
三、多元叙事模式	131
四、民族思维特质	139
五、结语:《红楼梦》审美无止尽	143
第四节 士林群像·谐婉叙事	144
——《儒林外史》文本审美意识研究	
一、文本审美意识:《儒林外史》美学研究的主体重塑	145
二、士林群像创构:《儒林外史》审美意象的基本类型	150
三、谐婉叙事模式:《儒林外史》叙事艺术的独特魅力	157
第二章 戏曲审美意识	165
第一节 清代戏曲审美概述	166
一、清代戏曲发展概观	167
二、清代戏曲文献与表演及审美研究	183
三、清代戏曲审美意识流变	203
第二节 意象·叙事·思维:洪昇《长生殿》审美之维	219
一、洪昇《长生殿》审美研究小史	220
二、洪昇《长生殿》审美意象营构	228
三、洪昇《长生殿》叙事艺术之美	238
四、洪昇《长生殿》民族思维特质	251
第三章 书法审美意识	263
第一节 遗民书法:尚“真”求“趣”的生命情怀	264
一、书体选择及其意象特征	265
二、法度变革及其实践新创	268
三、书学精神及其生命情怀	275
第二节 画家书法:尚“怪”求“变”的书学精神	282
一、书体创新及其意象特征	283
二、法度突破及其书法实践	289
三、书学精神及其审美意识	299

第三节 帖学：尚“雅”求“正”的经典传承	304
一、取法经典及其正统意识	304
二、法度承继及其创新意识	311
三、书学精神及其审美意识	324
第四节 碑学：尚“质”求“朴”之书学革命	328
一、书体选择及其取法变革	329
二、法度创新及其意象特征	343
三、书学精神及其审美意识	358
第五节 馆阁体：正统书法“中和”审美基调的异化表现	365
一、书体选择及其审美倾向	366
二、法度承继及其意象特征	375
三、书学精神及“中和”的异化	386
第四章 绘画审美意识	391
第一节 烟客山水：笔墨与图式中的审美传达	392
一、奠基：烟客山水画功画迹小考	392
二、集成：烟客山水的意象符号	396
三、纯粹：烟客山水的笔墨功夫	399
四、经典：烟客山水的图式风格	404
五、化成：烟客山水审美观念	407
第二节 南田花卉：没骨与简逸中的审美诉求	412
一、花坛扛鼎：南田花卉画迹画功及研究小考	413
二、写生集成：南田花卉的意象符号	422
三、师古出新：南田花卉的没骨技法	432
四、意情简逸：南田花卉审美观念	442
第三节 八大花鸟：水墨写意之法与险空悲逸之境	451
一、八大花鸟画迹画功及研究小考	452
二、八大花鸟的意象符号	465
三、八大花鸟的水墨写意技法	475



四、八大花鸟的审美观念	485
第五章 继承·潜变·转型：清代审美意识嬗变小考	491
第一节 集成式继承	493
一、文艺传统：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	493
二、思想传统：学术思潮的高峰迭现	496
三、文化传统：典籍整理的巨大成就	499
第二节 渗化式潜变	504
一、文学审美：由典雅向世俗	505
二、艺术审美：由正统向野逸	509
三、社会审美：由庙堂向民间	512
第三节 跨越式转型	516
一、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	518
二、国人变革维新的文化传统	521
三、晚清近代文化的横空出世	524
参考文献	528
索 引	548
后 记	565

朱志荣 / 主编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

ZHONGGUO SHENMEI YISHI TONGSHI

· 清 代 卷 ·

杨明刚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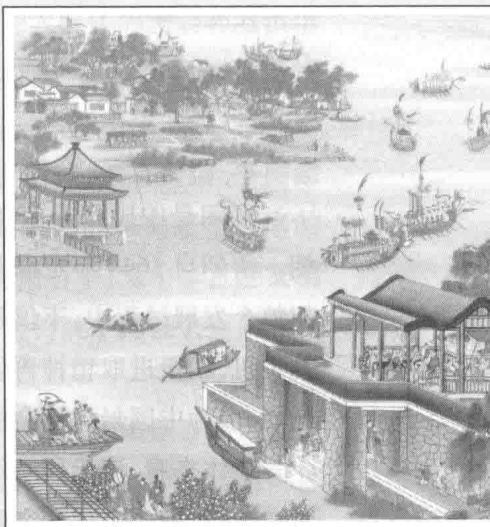


 人 民 出 版 社



... 绪 论 ...

绪 论



... 绪 论 ...



清朝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数十个王朝中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清朝自1644年定鼎北京至1911年清帝退位,延续了268年。在清朝整个发展过程中,不仅延续了已经步入末路的中国封建制度,还以其勃勃生机、积极进取精神再创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巅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

整体来看,清代处于传统社会的晚期,新的经济因素成长发展,加之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突融合,使得清代社会呈现出有异于前代的承继与断裂相交织的独特风貌。其一,清代依凭强悍的政治军事不断强化君主专制,使得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始终居于垄断格局,而晚明以来的民主启蒙思潮持续萌生并不断挑战专制威权,两大思潮的交织斗胜一贯清代始末,堪称此期最大的特色。清承明制,却改革宦官制度,设军机处加强中央集权,行督抚制、保甲制管理地方,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部分地区设将军,分而治之,思想文化上继续尊崇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思想专制空前强化。与此同时,在明清更迭、社会动荡、思想桎梏一度削弱的间隙,黄宗羲、顾炎武等猛烈批判君主专制,提出限制君权、分散权力、学校议政等一系列颇具民主色彩的思想,这些反君主专制的思想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堪称时代进步的写照,却终因清廷的遏制与扼杀,阻碍了它的进一步近代化。其二,有清一代日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帝国,传统文化借此得以集中梳理,中华文明得以有效承继、延续和传递。清廷肇始于东北,从统辖漠南漠北蒙古入手进据中原,嗣后又统一台湾、平定准格尔叛乱、平定南疆、统一新疆、抗击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定西藏归驻藏大臣辖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改土归流”之策,终在乾隆一

朝形成包括汉、满、蒙、维、藏、彝、白、回等数十个民族于一体的统一国家。多民族共生共通共荣、各民族融合共塑多元一体,成为此期最突出的特点。其三,得益于国家统一所形成的市场与货币流通,清代农业、手工业持续发展,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促成商人群体的发展和城市市民群体的迅速增大。城市与商业的勃兴堪称此期不同于前代的重要特征。其四,清代社会风俗总体上普遍呈现出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其中既有教育的平民化和世俗化,也有三教合流的世俗化,更有世俗、平民意识对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趣的渗透。其五,肇端自晚明利玛窦来华以来的西学东渐与传统的中学西传并行不悖,在冲突与融合中,为中华古老文明带来了异质的西方科技,注入了新鲜血液,鼓噪着传统中国社会迈向近代的转型与进步。

清廷治下的 268 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更,取得了足以令中外瞩目的空前的巨大成就,投射到社会、思想、文化乃至审美方面,更呈现出全方位的嬗递轨迹。其中,既有着面向前代的集大成式的全面总结与内在承续,更有着面向未来的雅俗并进的近代转型与外在影响。影响所及从周边地区一直扩展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赫赫东方大国。纵览清代 268 年历史,清代社会恰如晚清重臣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呈现出鲜明的多“变”的特征。有清近三百年间,中国人民历经了承续与断裂的剧变阵痛、天崩地解的思想突变、复古与典雅的正统倡导、思想启蒙的逐步兴盛,在承续与断裂的天崩地解中孕育着中国审美意识史上承前启后的高峰,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发展嬗变史中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一、清代经济发展与清廷财政格局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从繁荣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时期。此期,空前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传统的社会经济达到鼎盛,18 世纪更出现了康乾盛世。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二百年间,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军事及外交等诸多方面

颇多建树,为后世留下宝贵遗产,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大势。到了19世纪后半叶,由于它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战乱不止,致使综合国力大大削弱,愈来愈无法抵御新型的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惨遭严重损失,蒙受奇耻大辱,直至中国社会由封建逐步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最终被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推翻。

(一)清代经济总览^①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它决定政治、文化、军事、法制、思想等等。欲全面了解清代社会,必不可跨越清代经济。关于清代经济,学界长期存在“停滞论”与“增长论”的对峙。^②对此,戴逸先生曾在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上作过一个整体判断。如他所言,清代近三百年的经济发展,可用“驼峰型模式”来概括,即两头低、中间高。清初经济一片残破,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得很厉害,清初三四十年间经济十分萧条。康熙以后,经过恢复、发展,又经过雍正、乾隆达到高峰,发展到很高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侵略,清廷本身的衰败,又使得经济迅速跌落至低谷。^③萧国亮在上面提到的会议的总结中借助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所载GDP数据和清人法士善《陶庐杂录》所载户部存银数,以定量方式肯定了戴老清代经济总体上呈驼峰型模式的观点。^④燕红忠关

^① 有关清代经济的研究,历来是清史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其中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和清史所的研究最为集中和具有代表性。本书此部分内容参阅借鉴了吴承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萧国亮、戴逸、陈桦、张研、黄兴涛、毛佩琦、倪玉平等多位学者所著的《清代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及其他多种成果。

^② “停滞论”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尤以马克斯·韦伯、伊懋可和黄宗智等学者的宗教观、“高水平均衡陷阱”、“内卷化”(或“过密化”)等影响最为深远;“增长论”则主要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国斌、彭慕兰、麦迪森等人均持此论。

^③ 参见戴逸:《在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④ 参见萧国亮:《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总结》,《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于货币流通量的分析亦从另一方面佐证了这一观点。^①

依据史学界的惯例,常将清代经济分为前期与后期两段。清代早中期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此期的粮食总产量、重要产粮区单产、经济作物的发展均臻于新的历史水平;城乡手工业由家庭协作转向雇佣劳动、由个体小生产转向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大生产,出现早期工业化萌芽;茶楼、酒肆、戏院、旅馆等传统服务业持续发展的同时,商业、航运、金融等新兴服务业也日益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商业首推贩运贸易,航运尤以漕运为基础,广开初具近代规模的内河东西干线、南北水陆联运干线、南北洋海运干线,金融业则于传统典当之外兴起钱庄、票号,汇票、银票、钱票普遍通行,信用制度趋向完备,初具现代银行基本职能。但是,一个基本的史实是:清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并未曾有重大改进,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也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可以说,清代前期的经济发展总体上依然承续而仍未突破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全凭劳动力人口生产的增长和生产资料土地投入的增长来实现。及至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资本开始横扫全球,中国亦被卷入这一历史洪流。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中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迫赔款并让渡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列强在中国境内设厂、开矿、筑路、开航,导致中国民穷财尽,沦为半殖民地。这无疑是清代后期经济坍塌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也在客观上给予积重难返的中国传统经济一个颇具时代意义的重大经济变化和经济发展机遇,即生产与市场的开放性。然而,列强们显然不会轻易放任中国自主走向近代化、工业化的道路,不仅如此,昏聩愚昧的清廷也不特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战,更无识无力抓住有利的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鸦片战争后虽有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乃至戊戌变法等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却终因热衷于穷兵黩武、筹饷练兵、巩固皇权、消弭革命而成一纸空文,最终走向沉沦。

^① 参见燕红忠:《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清代经济的发展成就主要集中在前期的康雍乾时期亦即 18 世纪。康雍乾时期可谓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从历史的纵轴来看,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清代康乾盛世的粮食产量和供养人口数量较之汉唐盛世要高出许多,汉代粮食可供养 6000 万人口,唐代粮食产量可供养 8000 万人口,而清代则在 18 世纪就要供养 3 亿多人口,在 19 世纪初更要供养 4 亿多人口;从世界的横轴来看,据麦迪森和贝洛克的统计,清代康乾盛世时的 GDP 已居世界之首,占到世界 GDP 的 32%,远超过世界 GDP20%的第二名的印度,3 亿人口数量占世界 9 亿人口的 1/3,农业产量、城市数量、手工业规模、市场贸易等数据均居当年世界第一,^①足见清代中国的生产力之高。然而,这一判断是源自经济规模、经济总量的基准,而非人均经济水平。此期中国经济的本质仍然保持了传统封建经济的特性,体量虽大但整个结构仍是封建社会的结构,并未经历产业革命、走上近代化的轨道。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四大明显特征。

其一,此期经济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基础良好。甲申之变、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之后,清廷耗时五十余年,抛出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举措,不断巩固和强化战乱频仍之中的新兴政权;为缓解战后土地严重荒芜、人口大量流亡的不利状况,促使社会经济迅速回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清廷在大兴战端之余对内实行适度的减轻赋税、招民垦荒、安置流民、兴修水利、推广高产作物等迅速恢复生产的应对措施。应该说,清廷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成效是显著的。截至 18 世纪初期,清廷的政治军事局面已初步稳定,经济生活也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清朝的人口数量得以大幅攀升,甚至让清廷倍感压力;因战乱抛荒的大批耕地亦得以垦复,且面积得以进一步扩展;社会生产顺利复苏,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开始步入飞速发展期。政局的稳定为经济生活的平稳和日后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此期经济成就突出地反映在人口和耕地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猛增。尽管人口多寡并非总与社会生产水平呈正相关、人口数量也并非

^① 参见《〈清实录〉经济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最佳指标,但在生产技术相对低下、物质生活相对贫瘠的传统农业社会,一国供养人口的数量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客观地反映出其经济能力。有学者估计,整个18世纪,清朝的人口从初期顺治年间的1.3亿左右增至末期的3亿左右,增加近2倍之多;及至鸦片战争前夕更达4.1亿之巨,这一增速创造了中国历代传统社会之最,足见清代前期经济发展的规模。另有学者进一步对人口的构成加以研究,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人口中,农业人口大约占到全国人口的九成,其中,自耕农占42%左右,半自耕农占22%左右,佃农占35%左右,农业雇工占1%左右;非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一成,其中,工匠工人占30%左右,地主缙绅占25%左右,商人小贩占15%左右,吏兵占10%左右,盐灶人户占10%左右,畜牧游民等占10%左右;全国城镇人口不超过6%。上述两类数据均可推出清代前期的传统经济已经发展到高峰的结论。二是耕地面积扩大。清代类同前代,以农立国,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可谓是衡量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康雍乾时期的18世纪,清代各帝治下的政府均致力于以减免税收、移民、屯田等方式,开垦内地荒坡、河滩等零星土地、开发边疆农业,扩大耕地面积,土地垦辟成就卓然。据有关学者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全国耕地约6亿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至近8亿亩,鸦片战争前夕即1839年预计在8.5亿亩左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清朝全国耕地面积不仅已远超明末水平,且很可能已破10亿亩。无论哪种观点均足以证明清朝社会经济已发展到空前宏大的规模。具体到粮食产量而言,总产与亩产亦均有增益,有学者估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全国平均亩产为239斤,粮食总产量2745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653斤;其中,北方旱作区平均亩产114斤、总产量601亿斤、人均占有量464斤,南方稻作区平均亩产344斤、总产量214亿斤、人均占有量737斤;另有棉花、烟草、甘蔗、花生等商品性农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一成左右。^①

其三,此期经济成就还突出表现在商品经济与工商业史无前例的高度发达和区域经济错落发展上,尤以大量市镇的涌现和商品交易网的形

^① 参见《〈清实录〉经济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成标志。一是大量市镇的涌现。康雍乾时期,清代经济虽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现象,但市镇却在不同区域同步大量涌现,并承担着日趋专业化的功能定位。据郭松义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清代区域经济可分为以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多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因大量流民进入而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的开发中地区,以及地处边疆和偏远山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较落后的未发展地区四大类别。^① 经济发达地区的市镇圩集依傍中心城市、密度最大,江南地区紧靠苏州、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仅苏州、松江两府,乾隆时期市镇和圩集已达 210 个,较明末 59 个增加了 256%;珠江地区紧靠广州、佛山等中心城市,仅南海、顺德、东莞三县,清中叶圩集已达 334 处,较之明末 120 处增加了 190%。江南、珠江两地市镇圩集的平均密度均列全国之首。已开发地区的城镇作用日渐凸显,甚至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商贸中心,形成市镇经济网络,例如汉口镇、厦门港、湘潭、成都、重庆、樟树镇、河口镇、景德镇、宁波港、福州、芜湖、梧州、临清、济宁、胶州、咸阳,等等。而开发中地区如华北市镇的数量规模明显扩大,欠发达地区如西北、西南等地也出现了数量不等的市镇。这些城市、市镇的功能和定位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生变化,开始向专门从事某一类商品生产及交易的专业市镇转化,如以粮食集散和运销为主要功能的粮食市镇、生产棉织品的市镇、丝绸市镇、日用品商贸市镇等。这种专业化分工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反过来又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二是商品交易网的形成。传统封建生产方式往往使得经济发展受制于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因此,全国性商业网的建立堪称此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一局面的改观主要源自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与大量白银的输入和大商帮集团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性交易与远距离贸易的融通。明代形成的晋商、徽商、陕商等数十个商群入清后在经营品类、活动范围、资本数量上均得到极大拓展。^② 此期晋商活动范围已从明初“半

^① 参见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刘建生:《晋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